

# 把“志愿”搞成摊派，与文明背道而驰

## 评论员观察

如果为了表面上的“广泛参与”，有了“活动”却背离了“志愿”，那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以短期的效果换取长期的荣誉，说是弄虚作假一点都不为过，即便得到了精神文明的称号，证明的也不是文明的程度，而是弄虚作假的水平。

相比之下，徐州市文明办的回应，更硬气也显得更有底气，毕竟，网上流传的那份要求各单位“包挂”十字路口、公交站台的红头文件，的确货真价实。名义上的志愿活动，落到现实却变成了摊派任务，强制摊派换来的“积极参与”，显然不能反映这座城市真实的文明程度，以弄虚作假的手段来争取文明城市的称号，只怕是走向了文明的反面。

从报道来看，把“执勤”解释为志愿活动，其实就是应对舆论

的托词，反倒是硬气的市文明办工作人员比较“实在”。一来网上盛传的“红头文件”，有图有真相；二来如果不是摊派执勤任务，徐州市检察院也不至于反应如此激烈，不仅把拒绝协助执勤的态度发在了微信公众号上，还特别强调“得到市委支持”。

应该承认，徐州市检察院做出拒绝的理由是正当的，相比摊派执勤任务的一方更能体现文明的特征。检察院最有力的拒绝理由，就是中办、国办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规定要求“不安排检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事务”。而在“纠纷”发生之后，徐州市委宣传部主动表示“与上班时间相重叠的志愿活动已经调整”，则从侧面印证了最初的安排是有问题的。从中不难看出，相关部门出于创城的需要，将创城做成了短期内凌驾于各方面工作的一场“运动”。

从严格意义上说，运动式创城以及把志愿活动搞成强制摊派的做法，都属于弄虚作假。要知道，评选精神文明城市，是为了促进一座城市精神文明状态的提升，而这种提升应该是常态的、持久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之所以强调“志愿活动”的“参与程度”，就是因为只有真正自愿的参与，才是能够常态化的。如果为了表面上的“广泛参与”，有了“活动”却背离了“志愿”，那只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以短期的效果换取长期的荣誉，说是弄虚作假一点都不为过，即便得到了精神文明的称号，证明的也不是文明的程度，而是弄虚作假的水平。

类似的情况其实并不罕见，为了表面效果就用强制取代自愿的做法，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出现这样的情况，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是活动组织者对“结果”看得过重，有做表面文章

的动力；二是权力受到约束不足，“志愿活动”的“倡导者”有强制摊派的能力。这也就容易解释了，为何对摊派执勤做出公开拒绝的是当地检察院，因为在市级层面上，检察机关是相对独立的，更有能力自愿选择是否参与志愿活动。

一旦自愿变成了强制，结果往往与最初的目的背道而驰，饱受诟病的强制捐款就是最典型的现象——钱捐了很多却少有慈善的味道，强制之下心生逆反，连累到捐款者对慈善的态度。创建文明城市也是如此，本意是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若是自愿参与变成了强制摊派，最起码会让被迫参与者感到不快。如果创城成功，“自愿执勤”的人拿到一笔奖金，或许能抵消一下“怨气”；若是创城失败，只怕在内心会把参与创城曲解成一份有害无益的苦差事。

# “诈骗村”害人害己，地方官不能免责

## 大家谈

## □顾骏

临沂女孩遭电信诈骗后死亡一案，嫌犯都到案了，大家既为公安部门迅速破案叫好，也不忘分析电信诈骗猖獗的原因，源头信息泄露、银行虚假账户、电信运营商实名制形同虚设等因素都再次被扒了出来。唯独一个重要原因却很少见到探讨，那就是今天中国各类骗局明显具有地域性特点，全国有几个地方不但电信诈骗高发，甚至还细分到不同地方集中出现不同的诈骗类型。

一个地方形成骗子高度集中，且类型“独具特色”，显然说明此地风气已坏，看样学样，才会“蔚然成风”。可问题是，既然已经成风，那就说明犯罪俨然成了“公开的秘密”，何以承担着维护地方治安秩序的当地执法和司法部门，就

未见有效作为？当地的公务员编制没有空缺吧？各部门该有多少人，还有多少人，无论工资开支还是办案经费不见缩减吧？何以就没有见到“集中整治”，以致群起效尤，越演越烈？看看这次致临沂女孩死命的“助学金”诈骗的嫌犯，年纪都很轻，其中最小才19岁，不是看来自学来的，难道是天赋异禀，生来就会诈骗？

对于犯罪为何猖獗的问题，从来就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着眼长远，讲究深挖原因，尤其是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力图从源头解决问题，在电信诈骗领域，可以找出从电信运营商、银行等企业的见利忘义到立法疏漏、执法不力到地区贫困、青少年辍学率高等各种原因，但最后的结果几乎无一例外，就是谈归谈，骗归骗，骗子带骗子，案子连案子。

另一条思路是不问原因，先打击了再说，哪里案子高发，就集中整治哪里，直接抬高犯罪成本，让犯罪者人人自危，不

得不有所收敛。犯罪者都是“理性行动者”，对于犯罪的“性价比”从来高度敏感，哪里风险大，自然会逃离，反过来，哪里“安全”，自然云集。现在某些地方特定类型的电信诈骗集中，显然说明那里行骗安全得很，利润产出高得很，如此“优良的作案环境”为什么骗子知道了，入世未深的娃娃知道了，当地的政府连同村委会就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无动于衷？

如此睁着眼睛不干活的状态背后有着深刻的利益驱动。一方面这些地方只看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本乡本土，骗子衣锦还乡，盖起小楼，“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绩效显著”，只要受害人不在当地，管它钱从哪里来？另一方面不管一个地方犯罪如何扎堆，特色如何鲜明，当地官员的乌纱帽戴得稳稳的，遇到机会照样晋升不误，别的地方的人被幕后跳楼上吊，丝毫不影响他们官运亨通，如此“奖惩分明”之下，地方何来办案整治的积极性？

所以，真要从源头入手，先从治理犯罪集中地官员不作为查起，严肃问责，形成制度，让相关职位上的公务员不敢尸位素餐，才是正道。试想虽然诈骗案子的直接受害人不在当地，可当地一旦形成风气，个人竞相效仿，最后招致雷霆万钧的打击，到时受害人还不是“乡里乡亲”，尤其是其中的“年幼无知者”？多年来，有乞讨村，有卖淫村，有行骗村，还有传销村，最后受害的岂止“外地人”。当地人不说全部变坏，也有许多人变坏，难道承担着地方治安和教化之责的政府官员就可以心安理得稳坐钓鱼台？

一个社会遇到问题不稀奇，在电信技术发展那么快的情况下，发生诈骗多一些也可以理解，唯独长期发生却不加治理，甚至在某些地方形成独具特色的诈骗类型，则绝对不正常，而让不正常地方的官员得以正常地做官，那绝对是不正常中最大的不正常。（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 □媒体视点

### 房贷猛增背后 储蓄找到出口

今年上半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猛增2.3万亿元，同比增长1.2万亿元。在刚刚过去的7月份，以个人住房贷款为主的居民中长期贷款就新增加了4773亿元，甚至超过了7月整体新增信贷规模。而同期，我国企业贷款则出现了自2007年以来的首次单月负增长。房地产业不仅再次撑起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半壁江山，而且更为明显地发挥了保证中国居民财产保值增值的作用。

这种局面，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扭曲，自然会让宏观调控者忧心忡忡。正是要改变经济结构的扭曲，调结构才被当成重要的经济政策，反复为调控者提及。可问题在于，如此之大的经济体量，以及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都注定了“船大掉头难”。尤其是，在已经度过短缺经济期，宏观经济缺乏强大的增长点，市场中也缺乏足以吸引资金的产品之时，庞大的居民储蓄如何保值增值，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正因上述因素的共同挤压，在最近十几年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蔚为壮观的资产增值：庞大的资金涌向哪里，哪里就会价格暴涨。而在学术界，学者们惊讶于中国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迅猛增长，却未出现全面的恶性通货膨胀。其实某个领域资产价格的暴涨，就是变了形式的通货膨胀。

银行信贷为何全面涌向房地产？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换一种发问方式：看一看当前市场上，究竟什么东西还值得买？究竟什么产品还可以保值增值？如果不是有意的偏见，答案显然是房子，尽管我们也希望能有其他产品来替代房子，从而分散风险，把鸡蛋放在不同的篮子里。

普通人都能够看出的趋势，银行岂会看不到？无论银行需要承担多少社会责任，资金注定是逐利的。其实无法抱怨银行信贷为房地产暴涨推波助澜。相反，假如信贷都流向了过剩部门而成了不良贷款，这样的银行才应该挨骂。因为银行放贷出去的资金，其实是居民个人的储蓄。（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徐冰）

# 小微企业降成本，别只盯“五险一金”

## 一家之言

## □张敬伟

2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公布了来自该委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称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社保总费率为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39.25%，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13位。报告认为，“五险一金”费率长期居高不下使得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巨大挑战。

降低社保费率，是今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按照中央设定的路线图，这一降费行动从5月1日开始，加上去年开始的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费率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也被限定

为最高12%。也不排除，未来“五险一金”经过合并，变成更少的“险和金”。

然而，降低企业成本靠社保费率降低是远远不够的。降低社保费率是一项普惠政策，中小微和新创企业的成本降了，其他类型的企业成本也降了。在市场竞争普降的现实中，中小微企业的市场生存环境并未得到切实改善，当然也不会形成相对优势。融资难和贵的结构性难题不解决，中小微企业依然缺乏足够的发展资金。

以降低社保费率降低企业成本，不过是节流环节的“小惠”，难以破解中小微企业发展壮大的资金困乏大局。更重要的是，降低社保费率会造成社会保险基金池的不足。当养老保险降低，公积金缴存比例也被限定

又要求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待遇不降低，谁来补齐社会保险基金池不足的短板呢？简言之，降低社保费率，看似是经济和市场问题，实际上却是牵一发动全身。政策设计也好，各地执行也罢，须兼顾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最大限度地释放新政策的红利，而减少执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效应。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央关于社保费率降低的政策举措中，除了企业降成本，还包括了为职工减负让职工多拿现金工资的目的。也就是说，在企业社会保障待遇不降低的前提下，职工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率比例也要降下来。这就更增加了社会保险基金池不足的风险。

降低企业成本、为职工减负，是庞大的系统工程。除了降

低社保费率，还有全面降低税负和取消不当收费以及改革不合理的财税体制，譬如营改增等。除此之外，在法治基础上，营造更为合理的亲商文化，打造更为健康的资本市场，让中小微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本奥援。社会保险基金和社保保障基金等亦可以入市，获得增值保值的市场空间。

更为关键的是，通过政策引导和相关创新支持基金等，让中小微和新创企业更容易和更加经济地获得融资信贷支持。比如“互联网+”和“+互联网”的新技术平台，就可以充分发挥咨询服务和金融服务的作用，让企业获得更多新技术支撑的发展优势。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